

代 序

重视中国史学的考据传统^①

程 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

欣悉老友林华国教授将发表于1993年的《义和团史事考》重新修订，以现在的书名再版，笔者由衷地感佩华国这种在学术上不倦探究，求实求真的精神，也敬佩天津古籍出版社同仁们的慧眼：从一个目前学术界不少人已经逐

本文原为我和当年的硕士研究生许蕾合作的读《义和团史事考》的书评发表在《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现应天津古籍出版社之约并征得许蕾女士的同意作修改补充后付梓。修改此文时，《真相》一书正在排版校改未能先睹为快亦未能就新版内容发表感想特此说明。

渐淡漠的民众运动研究领域，选出这样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并对读者具有长远启示性的力作来。

笔者和华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在中国近代 恐怕很少有 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说是“众说纷纭”，也许只有对洋务思潮和洋务活动的争鸣才能与之相比 说是“长期”在于人们对洋务历史的争鸣大体上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才形成势头的，而关于义和团的争论则可以讲是经历了一个同百年历史并进的发展过程。义和团的谜一样的起源，它的浓厚的神秘气息和山洪暴发般的社会动员奇观，它同清王朝高层政治之间、同国家精英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强烈震动等等 都不仅是 1900 年那场短促悲壮的战斗所能涵盖的，而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国长时段秩序变动的方方面面，从诸如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晚清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民族的心理等深层角度去把握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因而也必然引发人们种种不同的以至于对立的感想和议论。

然而，对于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如此严肃的历史话题，不是靠任何空泛的议论所能切中的。对于义和团事件的评论 首先取决于对其复杂“真相”的轮廓。多年来 不止一代的研究者，对义和团史采取了某种区别于诸如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即将研究视角首先集中在那些最能反映运动复杂性的问题上，从若干难点、疑点入手，广泛勾稽材料，进行比较细致的史料考证、史实分析和理论概括，并且经过不同学术见解的争鸣和互补，求得对各种专题的逐个

突破、有序推进，以便于从历史的顺向和逆向，从事件的正面和反面，从晚清秩序变动的各个层次上去揭示义和团运动的真实面貌和内在规律。林书就是反映了如上学术状态和研究方法的代表作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带有考据气息。1899年10月正当这场运动刚刚勃起时，直隶吴桥县知县劳乃宣就写下了著名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他引用了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一份上谕和嘉庆二十年（1815）直隶总督那彦成的一个奏折，从这些官书曾经载入的“义和拳”的名称上，判定新起于直、东交界的同名反天主教组织来源于近百年前的民间教派系统中的离卦教。虽然这本小册子没有拿出嘉庆年间的“义和拳”或“义和门拳棒”同19世纪末以来反洋教的“义和拳”有什么组织关联的证据，但此说由于被时人认同和补充而广泛流传，以至于成为此后学术界讨论义和团起源时的主流观点。对这一观点的修正、发展和突破，是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一批中外史作（包括林书）的贡献。

林书只有一章讨论“起源”，但在笔者看来，该书实际上已经扩充了研究对象的界定，即将原来关于义和团组织起源的研究扩大为组织起源、地域起源和称谓起源的三项讨论。对于义和团是否起源于乡团、义和拳和民间教派的关系，它启动的区域和名称的由来诸方面都作了逻辑相当严密因而极具说服力的解释。比如在地域起源的研究上，由于拳民四处蜂起，当时的官方情报和稍后的一些笔记、史作将这一运动勃兴阶段

的地域界限搞得非常模糊。此后史学界基于前人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并不很清楚的记载，曾普遍认为义和团运动发源于山东，此后蔓延到直隶等地。“义和团起山东”的民谣，因此还被列为一些书的章节标题。林书对于这一成说作了相当详尽的辨析，提出了直隶、山东两省的义和拳在 1898 年秋天赵三多起义以后是并行发展的，两省地位大体相当，因此可以把两省都看成是义和团发源地的观点。义和团的称谓起源研究过去为相当多的史家所忽视，一种普遍流行但似乎又未经仔细推敲的说法是，1899 年山东巡抚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实际上，团体称谓是团体行为和理想的符号。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义和团起源和发展的自身逻辑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因此，它在起源研究中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林在爬梳史料时发现，上述的流行观点是以一批不可靠的记载为依据的。被作者一一列出的这些史料，一部分是都市文人耳食的传言，一部分是含有政治用意却又说法不一的报道，而且从文字和版本上也能找到它们之间彼此引用的明显痕迹。为考察“真相”，作者通过排比官方档案，如毓贤收到的报告和他的各种批示等文件，去追踪毓贤的决策和行动。他发现，社会上传闻的毓贤为朱红灯的组织“改名”的时间，这位山东巡抚恰好忙着派出马步队去扑灭朱红灯“滋事”和“严缉逸匪”。毓贤的行文一直称朱为“匪首”，也从未使用过“义和团”、“团民”之类的称谓。毓贤“改名”说的可信性因此可以排除。最后，作者通过对各种记载的比较和考察，并经文献记载和口述史料相互引证，初步判定改“拳”为“团”的时间，当在 1899 年 10

月 11 日朱红灯部与清军发生杠子李庄战斗之后和同月 18 日森罗殿之战以前的数日之内。并初步判定是这一部分义和拳自己改名为义和团。这类研究显示了作者治史方法的特色。如果说我们的某些学者往往习惯于有倾向性地挑选有关史料来建立某种观点，那么林书的方法首先是对各种观点所依据的史料进行审查，逐一排除那些不可靠的史料来澄清史实的真相，从而将自己的论说建立在可证、可信的史实基础上。

林书更为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是突破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归为一方，将义和团归为另一方从而形成的“侵略、出卖——抗争”的研究框架提出了对这三种势力的交叉互动关系作全局性和变动性把握的新思路。作者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那种特定的社会动荡、风云突变的历史大背景着眼，深入研究了国际国内如上三种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风波迭起互动关系 从中考察当年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作者将义和团运动史划分为庚子（1900）战前和庚子战争这样两大发展阶段，提出 1898 年至 1900 年 6 月以前的拳民抗争风暴初起于山东、直隶一带时，清朝中央和地方当局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出于统治集团的本性对运动采取的是相当鲜明的压制政策 而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说的“纵容、支持”的政策 但由于侵略者旨在使中国全盘殖民地化的意图同清政权要保持其自身半独立地位的欲求发生扞格 以及直东两省当局在具体举措上的某些歧异 才使得这项政策在实施时忽紧忽松，政令不一。如上状态促成侵略者进一步加大对清王朝的压力，反而导致了清朝高层政治集

团内部的分化和反弹，因此为运动向京津地区推进提供了有利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在特定的民族危机尖锐化和政治——社会格局复杂化所造成的权力空隙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义和团的实力在总体上呈分散、自发状态，他们的作战能力远不如清军，更缺乏像太平军那种攻坚能力，并没有形成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足以威胁清王朝生存的力量。因此，在运动第二阶段即庚子战争中，迫使清王朝“宣战”的主要动因不是分散进入都城的拳民，而是由于联军舰队大举进攻津沽，并公开宣布要向北京挺进的严峻形势，使民族矛盾急剧凸现。在随后的短暂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政府具有复杂多面的政策动向，它并非学术界长期认为的“真投降，假抵抗”，而是无可奈何的“一边抵抗，一边求和”，它对义和团也不仅仅是利用和出卖，而是形成过暂时和松散的联合御侮局面。战争中，北京攻打使馆和天津抗击联军侵略的性质、作用虽然有别，但清军均为作战主力，义和团民则在反侵略战争中表现了英勇的献身精神和起了不可低估的配合作用。至北京陷落，政治格局才进一步发生变化，清政府对外彻底投降，而义和团的余波则相应表现为“灭洋”和反清并举的新姿态。

写一本有独到见解的书难，而写一本同一批著名史学家的学术观点相异、自成一家之言的书更难。《真相》的作者以足够的理论勇气和历史责任感，展现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基本上澄清了纷如乱麻的一系列史实。他的成果，涉及当时的民众和国家、地方和中枢，以及中国和世界等多层领域中的复杂关系，向读者描绘了一幅民族危机严重，清朝权威下降，

政策的渗透力削弱，内部离心力量严重和底层民众违背王朝意愿，自发地动员起来打洋人的生动画面。

一本蕴含了丰硕成果的史著 需要作者具有充满活力、富有弹性的思维构架 更需要严谨、扎实的史料功底作为这一构架的支撑。一种不囿于成见、不人云亦云 敢于疑他兼之疑己的思维活力，洋溢于全书之中。这种思维来自于作者扎实的考据学功底和对于数学的爱好。作者在研读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的论著或记述时，总是细心审视其所述史事有无史料根据，对其所引证的史料进行原件查核及其可靠性、真实性的检验，进而分析各种史料对同一史实的描述是否矛盾，以及一批流行的史学观点能不能经由这些史料得出合乎逻辑的说明。这是一项对相关史作的既成研究成果进行重新评估的思维工程。作者审视所及，包括了迄今发现的反映义和团运动史的大批电文、奏稿、上谕、书信、笔记、报刊、方志、揭帖、口碑等史料记载。正是丰富多样的史料活跃了作者的研究思路，使他有可能在批判地吸收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学界的一批几成定论但并不完全反映历史原貌的观点提出质疑，严密地层层辨析 谨慎地提出修正。该书的评估或质疑 至少涉及了海内外 26 位研究者的 87 种著作或论文，其中包括了一批具有相当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或义和团运动史的著述。

以史料为基石的思维活力 限定了发言的随意性 判断的主观性。它要求考据者将怀疑精神和严密审识结合在一起。

《真相》的作者坚决反对史学界某些有失偏颇的研究倾向 以

及为了说明某一论点 而有意无意地主观性处理史料 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作法。比如迄今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一批著述，出于对民众运动的真诚歌颂，往往用不够完整的材料来论证天津之战中抗击侵略者的主力是拳民组织，但也有些论者对义和团的作用不屑一提。《真相》则运用了 25 种比较可靠的中外档案文件 经过对天津战役的各次战斗 各个阶段和各方面力量的严密考证、具体分析 得出了如本文前面介绍的认为该战役系以清军为主力的新观点。该书对攻打北京使馆的武力配备等问题也同样作出了精湛的辨析。

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遇到令人遗憾的史料空白。这种现象 或者是现有史料发掘之不足 或者是当年就没有留下甚至是早已销毁了史有明证的记载。如义和团运动中清王朝的高层集团在极小范围内的一些机密决策，已几无史料可考。正象荣禄所云：“当时宣战降旨情形 事属密勿 非外间所能探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 第 931 页 中华书局 1990 年版）恰恰是这类“宫廷秘闻”最容易引起后人的浓厚兴趣 多年来评论纷纭 但由于无法窥见其深层背景而很容易流于臆测。林书在考察这类难题时 谨慎地使用了“假说”或“存疑”这两种方法。所谓“假说”，就是在缺乏足够根据的条件下 将现有的、较为可信的史料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加以考析，从而对其反映的历史现象作出符合逻辑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经得起检验的推断。该书出色的“假说”之一是对慈禧攻打使馆的动因考析。作者详细研究了清军围攻使馆时尽力避免伤害外国公使的战术细节，提出

清政府攻打使馆是有意将各国公使置于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险境，企图以此对列强施压，促使其同意停战议和，而并非真想“夷平使馆”。应当讲，作者的这种推断是严肃而合乎逻辑的。这对清政府为什么要派亲信的武卫军为战斗主力，又为什么攻得时松时紧，当克不克等复杂现象，提供了可供解释的前提，既开阔了研究思路，也为同行们的继续探索留下了余地。他的见解被日本的义和团史专家佐藤公彦教授称作“极为富有魅力”是不为过誉的。

《真相》的价值不仅仅限于对义和团运动史中若干复杂现象的重新解析，更重要之处也许在于它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考据学在近代史研究中应有的位置，并且在考据方法论上给予同行们相当启示。

作者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体认，充分肯定了史实的客观性和可知性。他认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完整、真实地描绘历史原貌，如此才能为后人提供必要的经验与借鉴。换言之，历史学的诚鉴功能，应该建立在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的基础之上。诚然，特定的历史过程一去不再复返，而且也不可能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使之重现，但是，现存的大量人文传承物和传承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间所经历过的沧桑，而文字记载则更是人类文明史的主要的和比较详尽的表达方式。因此，如该书那样对相关文字记载进行尽可能详尽地爬梳、辑佚、整理、校勘和诠释——即通常所说的考据——是研究者尽可能靠近历史真实的重要手段。如果不

弄清一件件具体的历史事实，不从事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即使是具有良好理论素质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对历史事件的过程及其规律作出正确的总体把握和宏观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考据学所包含的积极因素，诸如敢于质疑、重视实证、严密审识、不事空谈等精神和方法，在今天不仅仍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检验研究者功力之高下的重要标准。

通过《真相》的探索可以发现作者在继承和转换考据学传统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这首先表现为他对史料观的某种更新。近代以来史学界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史料分为“第一手史料”（或“原始史料”如公文档案、会议记录、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和“第二手史料”（有别于前类的其它史实记载）。这种分类法的缺陷在于界定得不够明晰，不能涵盖史料的复杂性、多样性，并在实际运用时，容易造成技术评定标准和价值评定标准的混同。特别是一些初入史林的学人，可能出于对一手史料的技术确认而偏信其内容的直接性和可靠性。林书在鉴别和使用史料时另辟蹊径，提出了一种新的史料分类法，即以直接反映历史事实的史料为“原始史料”，间接反映历史事实但有明确来源的史料为“派生史料”，没有明确来源的史料为“无根史料”。这种分类法与前种相比，其特点是把对史料的技术鉴定和初步的资格审核结合在一起，而在两者之中更重视对史料资格的具体分析。比如在原来是被笼统界定为一手史料的文书档案中，就可能存在颇为复杂的史料类型，既有直接反映史实的原始史料、经过转述的派生史

料,也可能掺杂有来自传闻的无根史料。这样,如果把凡是能提供一定史实信息的文字组合看作史料的话,那么它们的价值就不仅仅表现为某种特定的记载形式,还要分辨其在各该形式中所占据的史料资格。能够直接反映史实的史料,可以是一个作为整体的文献,也可以是其中的某个部分,甚至可以是一两句文字。《真相》全书贯穿的这样一种对于史料的可弹性理解,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灵活、也更准确地利用历史文献,而尽可能避免误信误用。

史料的直接性并不等同于史料的真实性。两者之间的差距,同史料记载者或编纂者的主观倾向密切相关。因为包括原始史料在内的一切史料,都是特定史实和史实记载者的特定心态发生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们不仅反映史实记载者的动机、立场和态度,也不同程度地折射出记载者内心世界,诸如情绪情感、思维方式、价值尺度等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由于记载者和所叙历史事件的关系不同,即使是同一个特定史实,也常常依记载者的不同主观倾向而表现为众说纷纭乃至互相矛盾的史料。林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相当重视史实记载者或口述者的角色身份,善于分析他们的动机、需要和发言的位置,以便从各具不同倾向的史料中,考证出反映历史真实的内容。这是那些以嗜博泥古、兼收并蓄为特长的传统考据家所不可能具备的科学态度。比如作者的考据成果表明,即使是主观倾向性很强的史料,也可以从反方向挑选出其中可信的部分。一道火急求援的电报,对敌手的实力决不至于缩小;一件仇视拳民的奏折,其肯定拳民行为的部分决不至

于夸大。而对那些同记载者强烈的主观倾向相一致的内容，作者也并未轻易否定，而是将其同其它史料对照分析，清理出其中真实的成分。对史料中模糊的用语、含混的表述，则在考核中澄清原义，确认所指，分别处理。

史料的真实性也是相对的。这不仅是由于新史料的继续开掘会修正我们对某些现有史实的认识，而且随着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化，以及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会通，也可以对同一件史料作出多角度的价值评判。比如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深重的人祸天灾，造成一种“讹言横兴”、“怪诞支离”的社会景观。这种大量反映在文书揭帖、时人笔记中的蜚语流言，对于政治史、军事史而言自然是无根的和非真实的史料，但在作为义和团运动母体的乡土文化、民间习俗领域，它们却相当真实地体现了当时老百姓对于政治、社会、自然和超自然的认知和判断，反映了存在于底层社会的生动复杂的观念世界。详尽地爬梳、校订和辨析这类史料，对于研究中国民众在近代史上的心理轨迹和特定回应，将是很有意义的。

顺便还可以说到的是，近年以来，常常能读到这样的文字：某史作或剧作“再现”了一段什么历史。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谓“再现”，是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对历史时空过程的全面恢复，但历史研究者或作家们，都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将诸如当年政治家们那些正确或愚蠢的决策，还原为冗长的细节争论，频繁的公文电牍，将那些雄伟或惨烈的战役，分解成无数由工事、炮火、辎重以及士兵和民夫们的汗和血所组成的凌乱碎片。即使是我们昨天刚刚走过的小径，或发过的议

论也不可能在今天原封不动地“再现”一次。据笔者浅见，出版社之所以建议将林书更名为《历史的真相》无非是说明该书的作者出色地澄清了义和团事件中那些最关键最复杂的问题上的史料混乱，对这些问题作了尽可能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勾勒和概括，从而产生了新的历史认识。因此，对历史真相的认识过程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林书对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他的一系列的新认识，还在于产生这些认识的方法。

目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确实存在着不少不如人意的现象，个中原因颇多，但有些研究者的学风之不够严谨，功底之不够扎实，学术之不够规范，恐怕或多或少地同缺乏基本的考据训练有关。一些史作或追求观点的新异，或专事史料的猎奇，下笔洋洋洒洒，概念重重翻新，内容见所未见，却很少顾及这类概念和“史料”能否经得起历史事实的验证。史学工作者需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并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来及时调整观察历史事件的视角，但历史的基本事实却不会由于观察工具的更新而发生变化；史学著作应当写得新鲜活泼，引人入胜，但无影无根的奇闻逸事，却不能增添历史场景的色彩。《真相》的作者已经用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了考据传统作为史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也提出了倡扬科学的研究态度和严肃的学术作风的迫切性。“宁可少些，但要精些”——这是笔者对《真相》的一点读后感。

原 版 序 言

路 遥

(山东大学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

我国史学界的义和团研究兴起于六十年代。1960年在济南举行了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这是全国性的第一次讨论会。1980年又在济南召开了有国外学者参加的第二次全国义和团学术讨论会，它对促进义和团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那时起十多年来，已有不少专题论著出现，但拿它同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研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1986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性义和团研讨会后，我转赴北京邀约中国人民大学程 献一同拜访林华国同

志 磋商如何合作编著一部义和团运动史。不久 我们拟订了详细提纲，但迄今并未开始写作。其原因何在呢？那就是当我们各自拟订详细提纲之后，深感有许多问题一时尚难解决，不如先就各人的专长 花上几年对一些难题分别进行探析 也许对义和团研究的推进更有利些。在这几年里，我们各自取得了一些成果 这本《义和团史事考》就是林华国同志多年研究的结晶。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并列的三大群众运动之一 其分散性、神秘性和复杂性是其他群众运动所罕有的。义和团运动正因此而具有自己的最重要特征。可是多年来人们的研究 未对此特征予以深入探析 往往习惯于纯从“反帝斗争”的视角去考察 把奇幻诡异的历史画面简单化，因而无法揭其历史奥秘。

为要深入探索义和团，首先就必须从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更新。在考察这一复杂的历史事件时，除了要把握其特殊历史契机的主要环节外 还应从社会结构、文化心态、民俗传统、地域环境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等多层次、多视角去探幽。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着：义和团究竟是来自民间秘密组织抑或是民间乡团、武术自卫团体？这是义和团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的学者说义和团运动实是一场单纯的民族战争 去深究其组织来源毫无意义 有的学者却不是这样看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研究员在 1982 年威海召开的一次义和团讨论会上说：“义和团研究中的最大难度就是对义和团组织及其源流的考察，不弄

清它就说不清许多问题 必须投下主力攻克这个难关。'我个人十分赞同此说。华国同志所著的这本书，第一部分就是针对这个难题而撰的。先是爬梳各派观点 继而较其异同 评其是非。立论稳妥 实事求是，有充分说服力。诚然，尚留有不少空白点而未涉及 如直隶义和团的形成以及天津、北京义和团的复杂构成等等，都有待于今后去填补。

义和团运动聚然纷起于各地，而又在极短时间内迅速遍布于北半部中国。以往文献对各地活动的记载甚为缺乏，为要弥补这一缺失，有必要深入某些地区进行调查考察。据我多年的调查实践 认为下列地区是至关重要的：(一) 以曹县、单县) 为中心鲁西南地区；(二) 冠县、威县) 相毗连的直隶、山东交界地区；(三) 以新城为中心的保定地区；(四) 以涿州为中心的芦保铁路地区，最后则是(五) 经静海发展到天津和(六) 经黄村发展到北京的广阔地区。把这些地区的义和团活动勾画出来了，它的全貌也就大致弄清了。当然 开展此项调查研究，是不属于该书的任务。

义和团研究同其他历史研究一样，都要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只能在微观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综合，又必须在宏观的指导下进行微观剖析，两者不可分割。义和团运动的分散性、神秘性和复杂性特征贯穿于运动全过程 又映现在各个方面。即使以其反帝斗争和民族战争的最主要内容而言 也是如此。在运动的纵向和横向 都有各种因素、各种力量像网络一样无秩序地交错着，令人感到扑朔迷离，不可捉摸。该书对此作出显著成绩。它区分义和团运动为两大阶

段：庚子战前和庚子战争爆发后，以帝国主义侵略者、清政府与义和团三种势力之间相互错综关系作为主轴展开描述，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拨开其迷雾，把握其实质，还原其真相。如书中第二部分对庚子战前毓贤、裕禄、袁世凯与清政府对教案、义和团的各自对策与方针，爬梳剔抉，指明其“同”与“异”又如第四部分清廷对外战争态度、庚子围攻使馆真相和清军、义和团在天津战役中的各自表现与作用等像乱丝一样长期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经作者的精湛分析，既有宏论又有考订，基本上都澄清了。这是该书的最主要贡献所在。虽然它对某些问题如庚子后期清廷内部分裂加深、地方与中央离心加重以及董福祥甘军同义和团之间复杂奥秘关系未予论述，但对其他的重要问题大致都已涉及并作了详尽的分析。

全书篇幅虽然不大，但令人阅后感到很有分量。它是对以往研究的一个总结，推陈出新，给研究者以有益的启示！